

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

——对16—18世纪荷英中三国历史进程进行考察

薛 国 中

世界历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同时，国际贸易也相应发展，区域性的国际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凡是积极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得比较顺利、迅速，反之则艰难、迟滞，甚至走上畸形发展的歧途。16—18世纪东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进程，分别表明了这一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启示：从国际贸易来探索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注意的一条重要途径。

西欧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无不与海外贸易息息相关，而各国从事海外贸易之早迟，贸易规模之大小，贸易范围之宽狭，商务之兴衰，遂使资本主义成长有先后、快慢、强弱之分。本文篇幅有限，只拟就尼德兰(荷兰)与英国这两个富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它们16—18世纪的历史进程，藉以举一反三，或有助于认识前工业化时期国际贸易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重大意义。

尼德兰在欧洲是个蕞尔小邦，土狭民寡，且处于西班牙封建统治之下，国内能供应已经出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所需的营养是有限的，必须谋求海外出路。尼德兰的纺织工业(尤其是毛纺织业)和造船工业最为发达。佛兰德的呢绒在欧洲久负盛名，但本国原料不足，须从他国(主要是西班牙和英国)输入羊毛。造船工业的木材仰给于北欧。16世纪中叶，西班牙羊毛有一半是输往尼德兰的佛兰德地区，末期则输入更多，只有少量的输往意大利^①。

^① 《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第4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据1667年英国人的估计,每年从西班牙运入尼德兰的羊毛不下2.2万袋^②。英国是尼德兰所需羊毛之最大供应者,尼德兰商人通过英国设在法国的加莱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米德尔伯里及布鲁日的商站进行收购。后来,尽管英国政府限制羊毛输出,但英国的呢绒半成品却成为尼德兰发展精制毛呢的主要原料,如英国史学家利普森所说,英国在低地国找到了最好的销售羊毛和呢绒的市场;低地国从英国取得原料和半成品,在国内加工,然后运销“世界各地”^③。尼德兰从北欧输入木材,建造成价廉适用的海船,卖给欧洲许多国家。迄17世纪末,英国船只中还有1/4是荷兰建造的。尼德兰从北欧购来谷物,加工成啤酒,销售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

尼德兰通过国际贸易来发展本国工商业,安特卫普的情况是很好的例证。安特卫普继根特和布鲁日之后,在16世纪成为尼德兰的呢绒工业中心,也是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有人口10万,是欧洲第七大城市。外商云集,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他们携带大量货物来此交易。因而安特卫普也是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东方商品的集散地。16世纪40和50年代,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80%^④,对尼德兰整个社会经济的前景,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笔者迄今尚缺乏有关安特卫普进行国际贸易活动之系统而详细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星记载中亦可窥见其大体面貌:第一,1551至1552年,政府抽取的进口税约160万佛兰芒镑(Pound Flemish),出口税额为225万佛兰芒镑,若二者税率相等,则出口货物总值大于进口货物总值,对外贸易为顺差。第二,1543至1545年,出口货物总值为90万英镑,是当时伦敦出口货物总值的三倍,显示出尼德兰商品输出在欧洲的重要地位。第三,输入安特卫普的货物,主要是英国的羊毛和呢绒半成品,例如1560年进口总值将近1600万金克朗(gold Crown)货物中,英国粗呢占500万,差不多是总值的1/3。这些羊毛和呢绒半成品,尼德兰加工为精制呢绒输出。1565年安特卫普地方长官估计,每年输入的英国粗呢,价值在70万佛兰芒镑以上,尼德兰制造商加工为精制呢绒再输出,从中获取利润10万佛兰芒镑^⑤,利率达14.3%。尼德兰就是这样利用进口原料发展了工业,获得了利润,积累了资本。第四,安特卫普的毛织品系用尼德兰自己的船只,从海路运销冰岛、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南岸城市、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内河运销德国的中部和南部,远至法兰克福。16世纪末,安特卫普由于社会和自然变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莱顿,继起为西欧纺织业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得到发展。

海运业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有力工具。16、17世纪,尼德兰的海运能力在欧洲首屈一指,无与匹敌。16世纪下半叶它所拥有的商船,相当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总和(西班牙当时居欧洲第二位),大大超过英、法、德诸国。1595和1598年,在伊比利亚半岛各港口被劫夺

② 乔纳森·I·伊斯富尔,《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世界,1606—1661》(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and Hispanic world, 1606—1661*),牛津1982年版,第432页。

③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第2卷,伦敦1956年版,第197页。

④ 《新编剑桥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第2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⑤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第58—60页。

的尼德兰船只,就分别有400至500艘^⑥。1601年驶入伦敦港的船只共714艘,其中荷兰360艘,占半数以上,英国自己只有207艘^⑦。到1670年,荷兰船只运载量达到56.8万吨,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和苏格兰的船只运载量总和还要多^⑧。这时期尼德兰分布在北海—波罗的海从事贸易的商船(渔船不计其内)有735艘,运载量共计20.7万吨^⑨;在挪威从事贸易的商船约4万吨^⑩;在地中海有200只,平均每只运载量为360吨,从1585年起,将北海的鲱鱼大量运到意大利^⑪。总之,从波罗的海到北海,从大西洋到地中海,到处都有荷兰商船的帆影,或载运本国产品销于欧洲各地,或收购原料、谷物、鱼类等物返回本国加工,或从事转口贸易,或为他国运输。尼德兰通过自己建造的商船,把贸易触角伸入到欧洲各地,争夺各国市场。如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初叶,瑞典出口贸易总额中,有27%是荷兰人所经营的;17世纪,荷兰商船驶至汉堡和但泽(Danzig,今波兰之格但斯克)者,为数不少^⑫。可以说,不仅西欧,中欧与北欧的广大市场,都为尼德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英国是欧洲另一个资本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国家,主要依赖于毛织业。从12至19世纪,羊毛纺织在英国工业中居首要地位,是英国的主要财富和国家的支柱之一。与尼德兰不同,英国盛产羊毛且质地优良,但在15世纪以前,羊毛生产主要控制在教俗封建主手中。英国封建王朝不重视发展本国工业和海外贸易,让大量羊毛及农村家庭手工业纺织的粗呢,为外国商人(主要是汉萨同盟商人,其次是意大利商人)所收购,自己只满足于关税收入。13世纪末,羊毛输出关税是王国收入的主要款项。政府对外国商人给予种种优惠,对本国商人反施以种种限制和阻挠,致使自己未能充分利用其有利条件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

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生明显的变化,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英国虽然有丰富的羊毛资源,但发展毛纺织业所需的其他原料,如漂白土、染料、明矾、起毛草等,还须从海外取得;需要更大的市场来销售它的产品。这些迫使英国自己经营的海外贸易也相应发展起来,并排斥外国商人在英国的势力。都铎王朝为依靠商人的支持以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有利于本国工商业的政策:限制羊毛输出,增加呢绒出口。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纪初成立了两个贸易公司,即原料批发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分别经营羊毛与粗呢的出口贸易。他们与大陆许多国家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羊毛输出日益减少和呢绒输出稳步上升,原料批发公司逐渐衰落,商人冒险公司成为15、16世纪英国最大的海外贸易的垄断组织。都铎王朝鼓励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亨利七世常常借款给商人,条件是借款期间必须不断发展他们的商务。他扩大商人冒险公司的特权,与法国、西班牙、丹麦及其他国家订立一系列贸易条约,相互免除关税和最近几年加给商人的种种限制,以便让商人活动更加自由。1564年,商人冒险公司从伊丽莎白女王得到新的特许状,享有垄断英国与尼德兰的呢绒贸易和每年输出呢绒半成品3万匹的特权。在政府的支持下,商人冒险公司的商船出现于西欧各水

⑥⑦⑧⑨⑩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70、176、210、171、180页。

⑪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90、159页。

⑫ 赫尔曼·凯伦本兹:《欧洲经济的增长——1500—1750年欧洲大陆经济史》(Herman Kellenbenz,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Economy—An Economic History of Continental Europe, 1500—1750),纽约1976年版,第164、149—150页。

域,主要经营对北欧和西欧大陆的呢绒贸易。15世纪末,该公司向安特卫普输出了2.2万匹呢绒,占英国全部呢绒输出的1/3;一个世纪以后,输出额增加三倍,另有各类染色精制呢绒4万匹,总价值共100万英镑;17世纪初,王国的呢绒贸易,有2/3操在商人冒险公司之手。输出的商品,除大宗毛呢外,还有铅、锡、皮革、谷物等。诚如利普森所言,市场扩大是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伦敦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英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16世纪初至1700年,其人口由4万左右增加到30万^⑬,占全英人口的1/10,外贸额占全英外贸总额的8/10^⑭。据统计,16世纪伦敦年平均输出的呢绒,1500—1502年为49214匹,1542—1544年为99362匹,1545—1547年为118642匹,1550年超过了13万匹^⑮。伦敦呢绒输出之不断增长,标志着英国呢绒工业之长足发展。由伦敦输出的呢绒,不仅销往尼德兰,还销往德国的汉堡和埃姆登等地。英国人夸耀说,“用我们的呢绒,把半个欧洲穿着起来了”,由于穿了“我们的制服”,“全欧洲几乎成了英国的臣仆”。15世纪当英国呢绒贸易还依赖于尼德兰的市场时,曾认为英国离开尼德兰就不能很好地生活;而到16世纪以后,竟然宣称:“安特卫普对英国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她能与其他一些国家直接进行交易。”^⑯英国的海外市场扩大了。

为扩大海外贸易,16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组织,除商人冒险公司外,还有莫斯科公司(1554年),专营对俄国及中亚的商业;西班牙公司(1577年),进行对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伊士特兰公司(1579年),进行对波罗的海的贸易,在波兰的但泽和埃尔宾(今埃尔布拉格)设有商站;利凡特公司(1581年),进行地中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与南安普顿的商船,带着毛织品和锡等物产,远航至里窝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达叙利亚之贝鲁特和特里波里。可见这时期英国海外贸易发展范围之广泛,其他国家不能与之相比。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顺利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考察的只是尼德兰和英国17世纪以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的大体情况。区域性的市场仍然是有限的,不能满足发展中的西欧国家的要求。他们力求扩大贸易圈,向欧洲以外尤其是东方推进。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二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这新的活动场所,就是从16世纪逐渐形成的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开始了欧、亚、非、美四大洲的世界经济大循环。即:在欧洲人的组织与指挥下,用非洲黑人的劳动开发美洲的富源,以美洲的贵金属购买亚洲的商品满足欧洲的需求。新的世界市场是任何区域市场不

⑬ 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过渡中的英国城市,1500—1700》(P.Clark & P.Slack, 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牛津1976年版,第63页。

⑭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249页。

⑮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3卷(1968年版),第40页;第2卷,第69页。

⑯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187—188、197、199页。

可比拟的,它能为正在茁长的资本主义提供更大量的资金积累,廉价的劳动力,丰富多采的原料。西欧资本主义从中获利最大,得到充足的营养。

16世纪,贵金属已成为许多国家通行的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手段。欧洲所产贵金属不多,1540年为欧洲白银产量最高的一年,亦不过6.5万公斤,折合西班牙货币约226.2万比索^①。同年西班牙由南美和非洲输入本国的金银达500万比索。以后还不断增加,1591—1600平均每年将近4000万比索^②。这些是欧洲银产量的2—17倍。同期由美洲直接输入亚洲用以贩运东方产品至欧洲的白银,尚不计算在内。贵金属成倍、十数倍的增加,极大地加强欧洲工商业资本的力量。为开发美洲富源,尤其是金银矿藏,欧洲殖民主义者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等,从1601至1760年一个半世纪内,掠卖到美洲的黑人,共计430万^③。正是这些奴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尼德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胜利之后,不失时机地把目光投向刚刚形成的世界市场。1595年荷兰的一些冒险家开始向东方航行。1598—1599年,由雅各布·范·尼克(Jacob Van Neck)指挥的荷兰船队,驶抵东南亚之摩鹿加群岛,染指香料贸易。从1599至1602年,荷兰共派出51艘船只到东方^④,并于1602年组成“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集资650万荷兰盾,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资本的10倍,经营亚洲贸易。东印度公司在荷兰东印度殖民政权的支持下,极力排斥葡萄牙的势力,把它驱逐到中国的澳门一隅。1623年又将英国人逐出安汶岛,把他们侵略东方的势力限制在东南亚的范围。夺取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的企图虽未实现,但于1624至1661年占据中国台湾,垄断中日间的中介贸易,切断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这样,荷兰在17世纪完全独占了菲律宾以西整个南洋的贸易,成为亚洲市场的霸主。

东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驶往亚洲。1602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至1750年,平均每年29艘^⑤。这些船只,有的往返于亚欧之间,把少量欧洲货物运到东方,把大量亚洲货物(香料、绸缎、胡椒、瓷器、茶叶、咖啡、白布、铜、砂糖等)运回西欧,既垄断对欧洲的香料、咖啡和茶叶的贸易,又垄断欧洲商品在东南亚的销售。有的船只长期在亚洲进行转口贸易,如从中国贩运生丝至日本,所用船只在1640年有85艘。通过这些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利润,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东的红利平均为股本的18%,从1715年开始的6年内,平均利率为40%^⑥,在安汶岛与班达岛的

① 赫尔曼·凯伦本兹:《欧洲经济的增长——1500—1750年欧洲大陆经济史》,第109页。公斤与比索的折算比例约为1:34.8

②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3卷,第25页。

③ 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Jan De Vries,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40页。

④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95—196页。

⑤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59页。另据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第131页载,17世纪头二三十年内,从欧洲开到东印度的船只有250艘,其中荷兰占半数;50、60年代各400艘,荷兰至少占一半。

⑥ 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第136、143页。

香料贸易中,利率竟高达50—75%。1602至1732年,东印度公司分给股东的红利,总共达到23200万荷兰盾,为最初股金的36倍。此外,在1750至1759年间,东印度公司职员从印尼汇回本国的款额,平均每年400万荷兰盾,金银宝石等珍贵物品的价值尚不计算在内^②。这些巨额利润,成为荷兰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是本国和欧洲市场不可比拟的。

英国伦敦的商人,早于1570至1600年就积极筹组东印度公司,1600年正式成立并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特许状。该公司经营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原利凡特公司和商人冒险公司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最初资本为3万英镑。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资本不断扩大,1601年为68373英镑,1613年为418691英镑,17世纪最后10年达到1574608英镑,1709年与“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98年)合并,成为“英国东印度商人联合公司”,或仍称东印度公司,资本为316.3万英镑,比创办之初扩大了105倍。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往亚洲的船只,运载量大者600吨,比利凡特公司的船只大一倍,1610年达到1100吨。这样的大船在17世纪有30艘。另有若干小船在亚洲水域内长期进行转口贸易。一个世纪以后,该公司的远洋大船由30艘增加为90艘^③。公司的商业活动,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超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先是打破荷兰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直接与中国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英国工业的发展开拓出新的局面。如前所述,英国呢绒工业16世纪在欧洲跃居首位,输出额不断增长;但17世纪输出额反而下降。商人冒险公司在1606年输出毛呢12万匹,1640年却下降为4.5万匹^④。这固然与当时欧洲政治形势变化有关(英国爆发革命,大陆进行三十年战争),呢绒这种商品在欧洲以外难以打开销路,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不受气候温暖的亚洲市场所欢迎,但不久英国从亚洲和美洲输入了棉花,增加了英国工业新的活力,打开了海外贸易的新局面。棉织业的兴起,改变了英国在东方贸易中的境况,白银输出大为减少。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785—1786年为289万余弗(一弗相当于西班牙币一比索),到1792—1793年减为44万余弗。其中对中国的白银输出,1785年为281万余弗,1791年减为151万余弗^⑤。

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获得惊人的利润。按同期股金计算,年平均利率:1601—1613年为31%,1629—1630年为20%,1650—1657年为17.5—18%,1682年—1692年为20%^⑥。17世纪90年代,年利润绝对值当不下31万英镑,这是公司初建时股金的10倍,故有人说“东印度公司是英国财富的源泉”。

荷英两国在积极进行亚洲贸易的同时,还开展美洲及其他地区的贸易。荷兰于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WIC),最初资本为710万荷兰盾,经营对美洲新大陆的贸易。英国于1611年成立法国公司,经营与法国的贸易。1618年成立西非公司,开展对几内亚、贝宁、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一带的贸易。1672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从事奴隶贩运。1672—1711年间,该公司

②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上册,第355、358、359页。

③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293—294、291页。

④ 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第100页。

⑤ 百濑弘:《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80年版,第82页。

⑥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295页。

从非洲贩运出黑人达12万。仅牙买加一地,黑人奴隶在1700年达4万人,1712年增加到8万,1754年达到13万^②。1670年成立哈得孙湾公司,经营对北美的贸易。1710年成立南太平洋公司,经营对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贸易范围从麦哲伦海峡向西延伸到马六甲,囊括了整个东南亚市场。通过这些公司,英国商品输出额迅速增长,按总值计算,1613年为2487435英镑,1700年为6477402英镑,1730年为8548982英镑,1750年为12699080英镑,1760年为14694970英镑,1774年为15916343英镑,1800年为43152019英镑。^③开往美洲的船只不断增加,按吨位计,1663年为90000吨,1688年为178000吨,1701年达到261222吨,占欧洲各国至美洲船只总吨位586000吨的半数^④,表明英国在美洲贸易中占着优势,“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恩格斯语)。

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是区域市场地理概念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加速了社会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向欧洲不断提供丰富的原料使之生产日益增多的各类产品,输入大量金银以加速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向欧洲提出更多产品的需求,从而激励着西欧国家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巨大高涨,导致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由童年时期进入成年时期,封建主义的灭亡是无可置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世界市场的形成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在这伟大变革中,英国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三

中国是世界上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农业发达,工商业在16、17世纪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不落后于西方。有广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市场,中国内部的贸易比整个欧洲的贸易还要庞大。17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描述道:“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闻闻。”在东南沿海一带,有繁荣的商品经济,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有大量的雇佣劳动,在此基础上也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但是中国工商业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发展受到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挠和禁锢。于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如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商民,极力寻求向海外发展的途径。“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⑤安徽大海商王(汪)直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商人从事国际贸易的迫切愿望。16、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他们提供了远航海外,在国际市场上商战争雄的力量。太湖周围出产的蚕丝、绸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山东、河北、河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花棉布,长江两岸和浙江、福建的茶叶,闽粤的蔗糖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农产品和矿产品,均为海外远近国家所欢迎。

日本是中国商品(尤其是生丝和丝织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中国商船不顾政府禁令,私贩

②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347页。

③ 利普森:《英国经济史》,第2卷,第188—189页。

④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200页。

⑤ 《汪直传》(《借月山房汇抄》)。

至日本者连年不断。据日本史料统计,从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至1614年,驶日船只共190艘,平均每年47艘,其中1611年多至70艘,1623年(明天启三年)至1625年,共134艘,平均每年44艘;1631年(明崇祯四年)至1644年(中缺1633、1636、1638年),共530艘,平均每年53艘,多者如1639、1641年达到90余艘;1645年(清顺治二年)至1647年,共160艘,平均每年53艘^②;1648年(顺治五年)至1800年(嘉庆五年),共4716艘,其中1648至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共2614艘,平均每年46艘,1687年曾达到115艘。^③输入日本的生丝,常年为一二十万斤,中国船只直接运往者占半数以上,其余经荷兰、葡萄牙和日本船只,分别自台湾、澳门和南洋转输。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全赖中国供应原料。中国销往日本的商品,还有棉织品、砂糖、瓷器和茶叶。中日贸易,中国从日本获得大量白银,1648—1670年,共计17741万余两(日本计量单位),折合66688万余公斤;另于1648—1667年,日本输入荷兰人之手的白银39万余公斤^④,也大部分流入中国。

中国与菲律宾早在10世纪北宋时期已有贸易往来。16世纪中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中国海商在菲律宾的贸易对手主要是西班牙人。中菲贸易的商品很多,达50余种,主要有生丝和丝、棉、麻织物,占总额的90%。其他为陶瓷器、金属器、食品等等。生丝及各种纺织品的贸易额,按价值计算,1575—1583年,平均每年20万比索;1603年为133万比索;1609和1610年,平均为200万比索;1603至1631年间,葡萄牙人从澳门贩运至菲律宾的生丝和绸缎,贸易额年达150万比索^⑤。菲律宾出产棉花,中国商人收购运回福建纺织成布,返销菲岛,成为那里畅销的大宗商品。16世纪后期,中国每年输往菲律宾的棉布1万余匹,棉线7000多斤;17世纪中叶,每年输入棉布14万至18万匹,最高年份达到24万到29万匹,其中一半以上转输于墨西哥和秘鲁^⑥。生丝、绸缎经菲律宾岛而销售于墨西哥和秘鲁者也不少。中国商品价格物美,颇有竞争力,严重威胁到西班牙在殖民地的垄断利益。在中菲直接贸易及经菲岛与拉丁美洲间接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顺差地位,大量商品输出,大量白银输入。16世纪最后10年和17世纪头10年,是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最好时期,每年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运到菲律宾的白银,通常是300—500万比索,其中1597年达到1200万比索,接近西班牙官方在美洲贸易的总额。^⑦在被认为是17世纪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高峰早已过去的1632年,马尼拉基督团体告诉菲利普四世说,每年有240万比索(68900公斤)白银运到马尼拉其中必有相当一部分输入中国。^⑧

② 岩生成一:《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引自魏能涛:《明清时期中日长崎商船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③ 本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7—628、639—645页。

④ 《大日本货币史》(引自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渐本末》,大东出版社,1943年版第299—300页)。两为日本重量单位,1两=3.75克。

⑤ 引自沙丁、杨典球:《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⑥ 佟屏亚:《农作物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209—210页。

⑧ 威廉·S·阿特韦尔:《1530—1650年期间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William S. At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过去与现代》(Past and Present), 1982年5月号。

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与各国商人有多边的贸易关系。除菲律宾外,在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等地,与各地土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有密切的商业往来。16世纪葡萄牙人控制南洋后,中国商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伙伴主要是葡萄牙人。17世纪荷兰人则成为中国商人在南洋的主要对手。无论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统治时期,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处于主动地位。他们不仅从本国输出大量商品,如丝绸、瓷器、药材、漆器等售予欧洲人,而且还就地进行转口贸易。据荷兰史家范·鲁尔估计,17世纪中国每年输入南洋(不包括菲律宾)的生丝2000—3000担(每担133磅),其中运销爪哇之万丹者约三、四百担;销往南洋的绸缎每年1—2万匹;瓷器仅1620和1622年两次,分别为64500件和75000件。中国商人在南洋进行转口贸易的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胡椒。爪哇在15、16世纪每年出产胡椒6万袋(2400吨),中国商人收购约5万袋^③,其中大部分连同在摩鹿加群岛收买的香料,一起运到马六甲,贩卖给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由他们输往西方。据16世纪60年代后期英荷两国观察家估计,输入到欧洲的胡椒,有一半是通过利凡特商路(由亚洲进入地中海至西欧的商路)运去的。《剑桥欧洲经济史》说:“整个16世纪,地中海是丰富多样的商业活动舞台,但所有最丰富和最受欢迎的贸易,是来源于地中海以外的商品:香料,尤其是胡椒。……欧洲的香料全来自东方。整个中世纪后期商业交换的链条,把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种植者与威尼斯商人元老联结起来,链条的东端,贸易为中国人所操纵。其帆船把东印度的肉豆蔻和丁香收集起来,运到马六甲的马拉扬大港。从马六甲横渡孟加拉湾到达印度的贸易,则掌握在穆斯林、印度、马来西亚或阿拉伯的商人之手。”^④

茶叶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大宗商品,17世纪前半叶一直为荷兰人所垄断。他们从亚洲运到西欧,销于法国、英国、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7世纪下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打破荷兰的垄断,在爪哇的万丹或马来亚各港口,直接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1669年英国在广州和厦门取得商业立足点后,中英茶叶贸易进一步增大。至1700年,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茶叶100吨^⑤。18世纪末,英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茶叶两磅,只按1700年伦敦30万人口计算,每年需从中国购进茶叶60万磅。按1703年大大降低了的价格每磅16先令(1650年每磅6—10英镑)计算,每年需向中国付出48万英镑。仅此一项贸易,中国即可获得十分可观的利益。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尚无大量适合东方市场需要的商品。在此情况下,欧洲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主要用白银来支付其对中国的贸易。因而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据百瀚弘所提供的数字表明,西欧国家(英、法、荷、瑞典等)向中国输入白银一直在增长,从1777年的139万余弗,增长到1787年的551万余弗。其后由于英国率先实行工业革命,向东方输出的棉织品日益增加,情况才有逆转。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增加了中国贵金属货币的流通量与储备量,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实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由征收实物改为征收银两,与大量白银输入有关。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中国政府如能象西欧国家一样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对外贸易能持续保持优势,并进一

③ 范·鲁尔《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与社会》, (J.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阿姆斯特丹1955年版, 第126、125页。

④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4卷, 第163页。

⑤ 《新编剑桥近代史》, 第5卷,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399页。

步扩大,极有可能如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中所说的那样,“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即进行产业革命。那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跃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已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得到长足发展,最后很有可能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沿着世界历史所开拓的道路前进,而是衍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误差的后果,深深地影响到后代。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实行了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错误政策。明清两朝政府固步自封,对内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抑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闭关自守,厉行海禁。他们自己不重视国外贸易,也不允许广大商民去发展海外贸易,以利用国际市场的开放经济来促进本国工商业的繁荣昌盛。国际贸易是一场商业竞争,区域市场内有激烈的竞争,世界市场形成后这种竞争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中国商民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本来处于优势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一面迫切要求与中国开展贸易,另一面对中国侨商非常畏惧和憎恨,制造一连串流血事件,企图以暴力来使中国侨商屈服于他们的统治。面对这样尖锐的斗争,中国封建政府不是像西方国家政权那样,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予以鼓励、支持和保护,恰恰相反,极力禁止中国商人出海,限制中国货物出口,蔑视海外侨商,认为他们是“弃家游海”,“自弃王化”,“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是“咎由自取”。结果,中国侨商孤悬海外,得不到祖国的支持和保护,任人宰割,其斗争失败乃势所必然。

中国海商缺乏自己的组织,也是自身的严重弱点,利普森说得好,“全国或国际市场,需要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组织”。世界市场中的国际贸易更须如此。《剑桥欧洲经济史》列举16—18世纪进行殖民贸易的5个主要国家时,把西班牙与葡萄牙同荷英法三国区别开来,指出后者“最典型和本质的因素”,是将个别的商人联合为强大的经济实体——被赋予特权的贸易公司。这就是荷英法在殖民扩张中战胜西葡的重要原因。中国海商中有象王(汪)直、李旦、郑芝龙这样一些拥资巨万的商贾。据范·鲁尔说,有个中国商人叫王三(译音)的,在南洋一带活动,其资本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资本的1/10。但这些豪商巨贾,各自进行贸易,虽也成群结党,合为团体,却只是为了在海上武力自卫或进行劫掠,并非严密组织的经济实体,更没有本国政府赋予的特权,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难以与西方有组织的经济团体比权量力。国际贸易竞争失败之后,中国侨商一部分长期流寓异国,一部分回国后因政府抑制工商而将其资本买田置地,从事封建性的农业。这样,中国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幼芽,不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充足营养,故而发展迟滞。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却不失时机地在国际贸易中迅速成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毫无疑问,从国际贸易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成长,只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一个方面;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考察,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要在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在国际斗争中求强竞胜;这是历史的洪流;而闭关自守,回避竞争,只是阻碍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历史留下的沉痛而宝贵的教训。

〔本文作者薛国中,现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